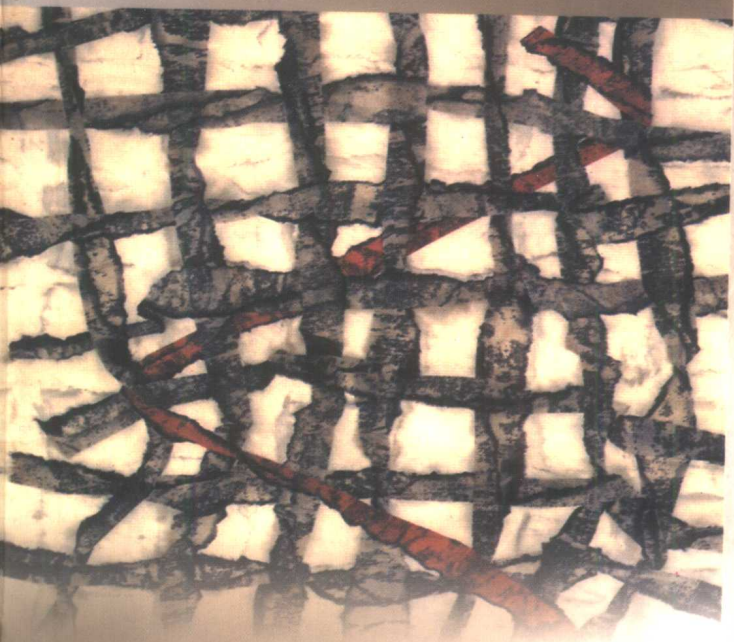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主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牛汉 邓九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歲月文丛

张岱年题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主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牛汉 邓九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季羨林主编.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岁月文丛)

ISBN 7-5302-0615-X

I. 我… II. 季…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510 号

岁月文丛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WOMEN DOU JINGLI GUO DE RIZI

主编 季羨林 执行主编 牛 汉 邓九平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375 印张 416 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5302-0615-X
I·600 定价:24.00 元

卷 首 语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岁月，依旧历历在目。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年知识分子生经忧患，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他们在风浪中经受了磨炼，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他们更愿讲真话。

——季羨林

巴金是个善心的人，他想通过他的笔，把他经历过的那些使他痛心的事，暴露在太阳底下晒晒，杀杀菌，让别人可以不致再受同样的祸害。这番心意令人起敬。

我当然不敢自比巴金。他长我近 10 岁，我永远也追不上他。但毕竟共同经历了三个朝代，而且还同样莫名其妙地，从这至今还没有人能说得明白，怎么会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这二十年反常岁月里活了过来。正因为有这一点相同，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这些语言埋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的心里，很少写成文字。有人不会写，有人不敢写。一有人写了出来，这些人必然感到痛快。痛是难免的，谁没有伤疤？痛得愉快，这些话埋在肚里会发霉，伤人心骨。

——费孝通

用鲁迅的眼睛看旧史，来龙去脉洞若观火；看新史，通向未来的路依稀可辨。

在历史的长途上，个人的恩怨得失自不足道；而血肉换来的经验，却该认真记取。前者宜粗不宜细，后者宜细不宜粗。

——邵燕祥



1
2008/08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我国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备受磨难。他们遥远的呼声，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进程的伟大动力之一。

《岁月文丛》广泛收录了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描述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的种种经历以及记录自己探索与思考的佳作，有火有泪，有永不泯灭的良知和对祖国真诚的信念，是史学著作、社会学专著不能替代的宝贵财富。

“文革”十年，乾坤倒转，人鬼莫辨；文化之命既已革，民族之魂行将断。魍魉横行，千村鬼哭；斯文扫地，大厦崩坍。那段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至今回首，犹令良知泣血，志士扼腕。收入本卷中的34篇文章记录了中国拒绝遗忘的思想者对民族这段悲情史的执著拷问：创痛巨深，殷鉴不远。述往思来，是为智焉。

目 录

伍修权	“文革”亲历记	(1)
李雪峰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30)
张耀祠	毛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么	(45)
龚育之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48)
附：关于《〈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一文的两封信		(80)
张承先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83)
印红标	“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03)
安建设	十年动乱第一案 ——对“三家村”的批判	(118)
张守仁	《燕山夜话》被批前后 ——我的十年经历	(135)
杨 欣	杨献珍的“哲学罪” ——杨献珍蒙冤二十年纪实	(152)
李 永	“阎王”的十三载冤狱 ——陆定一蒙难纪实	(169)
秦 川	我眼中的“阎王殿”	(184)
穆 欣	新闻界在“文革”初期受到的严重冲击	(204)



李 庄	喜喜忧忧“想不到” ——回忆“文革”前我在《人民日报》工作 的日子	(234)
李 庄	“文革”中“帮文风”给我带血的记忆	(243)
园 丁	《解放军报》变相停刊始末	(252)
何 蜀	“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	(264)
印红标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	(287)
印红标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运动 的兴起	(303)
王海光	红卫兵运动始末	(316)
唐少杰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兴衰	(347)
王友琴	“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364)
陶 正	我本随和	(391)
徐友渔	人与事：一段精神历程	(400)
陈凯歌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少年凯歌（节录）	(410)
陆星儿	遗留在荒原的故事	(438)
张抗抗	遗失的日记	(457)
赵之荣	插队傣家寨	(467)
胡东放	黑龙江边的一段回忆	(471)
嵇 伟	我的知青梦 ——梦八年重返上海	(478)
刘小萌	下乡女知识青年婚姻剖析	(484)
刘小萌	“文革”中知识青年的迷惘与觉醒	(498)
王 晨	遇罗克喋血记	(516)
张天来		
公 刘	刑场归来	(540)
金 凤	他，倒在了“两个凡是”的枪口下	(546)

“文革”亲历记

在我国当代历史和我个人的经历中，横亘着一个不可忽略和难以忘怀的阶段，就是被称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十年中，我有七年半时间，即从1967年4月到1974年9月，是在所谓的“牛棚”中度过的，加上我开始受冲击和等待重新工作的时间，前后正好八年，恰巧与我在外交部和中联部工作的时间相等，成为我建国以后的第三个八年——一个极不正常、度日如年的八年。

这场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大量的小说、电影和戏剧等文艺作品，也对它做了形象而生动的反映。不过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这场运动给自己留下的强烈印象，首先是成千上万名革命干部以至普通群众，遭受到林彪、“四人帮”各种方式的残酷迫害。许多老同志、好同志，在这场浩劫中不幸丧失了生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内战中我能活过来，真算是幸存者。尽管我在这个时期内的经历与别的同志相比，不算最艰难悲惨，但在总的方面是共同的，由于每人所处位置和情况不同，各自的遭遇和感受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还是把自己这八年的生活记述下来，它对于后人尤其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也许是有些参考价值的。



风暴骤起

1966年一开始就预示着风暴将临。林彪通过他的那帮“秀才”们大肆鼓吹“突出政治”等谬论，公开与《人民日报》阐述的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正确观点“对着干”。江青伙同林彪又搞了个什么“座谈纪要”，造谣惑众地说我国已被“黑线”、“黑帮”“专了政”。康生等又利用某些报刊兴师动众地大批什么“三家村”，叫嚷“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等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不过我由于一直忙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开始对此并未过分注意，并且以为所谓“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文化界的事，同我们是关系不大的，自己又多年来从事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在“反修防修”问题上，自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此对这场运动最初没有思想准备，对它后来的发展及其影响更是没有估计到。

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从参加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会议主要是通过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同志的“反党错误”，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和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林彪在会议中耸人听闻地做了一个杀气腾腾的“政变讲话”。会议期间，毛主席不在北京，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但是身在南方的毛主席，通过康生等人遥控着这次会议，因此会议一开始就是极不平常的。给我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康生的表演，正是此人，在会议过程中起了极坏的作用。

会上康生首先抓住一个《二月提纲》问题大做文章。会前中央原有一个以彭真同志为组长，有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同志和康生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他们根据当时学

术讨论中的一些问题和情况，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汇报提纲，就文化革命问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文件写成后，曾由彭真同志向毛主席当面汇报过，后来又由中央作为文件向全党下发。康生本来参加了这个文件的研究和拟定工作，但是他察觉到毛主席对此另有想法，并不赞成这个文件，就马上面孔一变，矢口否认他曾参与这个文件的制定工作，并向毛主席谎称这个文件是将他排除在外的。有人查到文件上有他的名字并经他画了圈，他竟说文件送给他时他并没有看，那上面的圈是由秘书代画的。这样的话他到处讲，有一回还专门向我们讲，可是我听了当时就有看法。我想就算你并未参加这个文件的拟定，后来将文件送给你时，你作为五人小组成员，就有审阅的责任，你应该看却没有看，这至少是政治上的失职，也证明别人并没有背着你。你说那文件自己并未圈阅，只由别人代画了圈，实在不能自圆其说，搞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把别人都当成了白痴。不过康生这样开脱自己、倒打一耙的结果，却使毛主席相信了，他也认为《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康生搞出的。康生就用这套手法不仅使自己骗取到毛主席的信任，还使彭真等同志受到了诬陷，使原五人小组除康生以外的四个人全被“打倒”，又导致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改组，造成了严重后果。

所谓《五一六通知》正是在批判了彭真同志“错误”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康生当然地成了这个《通知》的主要草拟人。会前他曾多次飞往杭州面见毛主席，探知他的意图，取得他的宠信。文件在会议上提出时，康生又成了这个文件惟一的阐述者。我记得他在会上对《通知》稿做了逐段逐句的讲解，还借助毛主席的威望来推销自己的一套，说毛主席在哪些地方，做了多少次修改，有过什么指示，自己又是如何领会的，洋洋得意得简直不可一世。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紧接着这次会议，康生又导演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事件。这张最早将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一度被吹成“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其意义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等等。后来康生曾不打自招地说，这张大字报是他派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去北大“直接领导”聂元梓等人联名写出的。他得意忘形地说，没有他康生，这张大字报根本不可能出现。事实确是如此，他幕后导演出的这张大字报贴出后，马上又将大字报全文抄送给毛主席，并立即取得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决定将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结果不仅由此冲击了北京市委，还在全国点起了大火，十年内乱也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文革”开始阶段，我还在部里抓工作，没有直接卷入运动。对于彭真、杨尚昆等比较熟悉的老同志突然遭到批判，尽管不太想得通，但还是努力地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这场运动。不久我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时“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全面展开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被认为犯了“错误”，从主要领导岗位上被拉了下来。而建国以来很少工作、近年内大搞所谓“活学活用”运动的林彪，突然跃升为中央惟一的副主席，中央书记处已不复存在，康生、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一下子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其中指出，党内许多负责干部对这场运动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我实际上也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在整个形势的触动和影响下，特别是看到毛主席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意识到这次运动非同寻常，但是仍未想到它同自己有什么切身关系。

十一中全会后不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林彪作为他的“亲密战友”也占据了

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心位置。检阅开始以后，许多“革命小将”和“造反战士”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向毛主席和林彪以及陈伯达、康生等“文化大革命”的头面人物一一献上了红卫兵袖章。我不是这些“小将”们心目中的“革命左派”，当然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荣誉”，只能看着别人被佩戴上当时十分招人的红袖章。检阅中间休息时，我看到刘少奇同志孤寂地在一旁呆坐着，没有什么人去接近他。我这人有点怪脾气，见别人不大理他，偏要去找他谈谈。我过去同他工作接触不少，一向对他很尊重，这次便主动坐到他旁边，同他闲谈起来。开始是寒暄地问问他的健康状况，后来就谈起当前的运动来了。交谈中我发现他对运动也是很理解的，他说他把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地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我当时也是这个想法，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也不便明确地表示支持他，当然也不愿说不同意他的意见，只说自己还没有认真看那张大字报，打算回去再找来好好读它几遍，看看到底有什么意义。

“八一八”检阅红卫兵以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便一哄而起。那些年轻娃娃们，纷纷“杀”向社会，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联部也出现了这样一批“革命小将”，他们到处抄家查“四旧”，结果将李初梨同志搜集的古董也当“四旧”抄了出来，一车一车拉走没收。后来他们听说康生也爱搜集古董，那不全是“四旧”，才退还给了李初梨同志。当时“小将”们劲头很大，唐明照同志由于长期在国外工作，存有一些西服，也被他们连箱子抄去了。可是他们头脑太热了，破“四旧”竟破到了王力家里，王力的妻子自恃家里有那么个“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对红卫兵们十分骄横，把自己的高跟鞋扔到他们面前，将他们不客气地赶走，结果闹起了纠纷，惹得中央领导人都知道并过问了这事。其实这是他

们“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

在这股“革命”热潮中，我家里的孩子们也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分别参加了所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的还成为小头头。只是他们一开始就分了派，经常为一些“不同观点”争论不休，回到家里也不断谈论和辩论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有时还将他们各自的“战友”领回家来，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国家大事”，弄得我家里经常十分热闹。我由于尚未直接参加运动，正好从他们那里得知不少情况和动向，也感受到一些青年人的热情。所以有时也很有兴味地听听他们的交谈和讨论。那时他们并没有搞什么打砸抢活动，只是真正地要革命，虔诚地响应着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其实对当时这场革命，到底怎么革法，别说是他们，连我也闹不太清楚。我们都从不同的地位，以不同的方式，被卷进了运动之中。我在中央的会议上，谈了自己及家中的情况，被编进了会议简报，竟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在10月间举行的中央汇报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接触红卫兵的情况，以我为正面例子讲道：“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他认为这是我联系群众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件事以后在全党也传开了。其实它恰恰反映了我对“文化大革命”最初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全国各地，所有部门，无一不漏地被卷入了运动之中，中联部当然也不是桃花源。康生早就插手部里的工作和运动，又将他得意门徒王力从部里提拔到“中央文革小组”，因此中联部的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他们的操纵和干扰。运动开始以后，按照《十六条》规定，部里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领导运动的权力机构。我们这样的“当权派”，不是被排除在外，

就是被当做“监督使用”的对象，不仅不能干预部里的运动，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支配了。

中联部较早被拉出来当“靶子”的部领导干部是许立同志。他是分管外国党培训干部教学工作的副部长，是一位勤恳忠实的老同志。他的所谓“罪行”有这样一条：有次讲课时他偶然提到，苏联哲学家们的著作，都是一部又一部大厚本子，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只有一二本小册子。就这么很平常的一句话，加上别的被歪曲夸张了的事，经过无限上纲全成了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可是许立同志颇有股倔劲，随人怎么批他总是不认错，被认为“顽固抗拒”，打成了“三反分子”，斗得他很苦。他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后来被赶到“干校”去改造，还被迫干掏厕所等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最后终于被折磨病了，在缺乏医疗的情况下十分悲惨地被迫害至死。

当时我还没有被批斗，部里的运动是在康生、王力之流的操纵下，我们有意见也不被人理睬。就在“造反分子”们狠斗许立等同志时，我针对他们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反复强调《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造反派”们“君子动口不动手”。在一次会议上，我说许立同志“人家六十多岁了，又有高血压，请同志们还是要照顾这一点。再过三十年以后，你们也六十岁了，如果那时你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就会觉得应该怎么办了”。我原想提醒和告诫一下“造反派”们不要搞得太过分，谁知反而被他们抓住，说我这是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观念”，说我的讲话干扰了造反派的“革命热情”和“造反精神”。这样，我自己也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后来眼看着一些同志受迫害而无能为力，至今想起还觉心中沉重。

当时运动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康生之流对中

联部只斗争了许立等几个同志，当然是很不满足的。6月中，他带着王力几次来到中联部，看了部里的大字报，亲自向部里干部做了“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生气地批评中联部运动的方向不对头。说“毛泽东思想还没进中联部的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还指着大字报道：“他们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没有抓住大方向。你们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判‘三和一少’？这才是大方向！”他说中联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该是批判斗争王稼祥，他是提出“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应该将他批倒批臭！他诬蔑王稼祥同志是“定时炸弹”，说“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还大肆攻击彭真等同志，同时又心怀鬼胎地说他自己不是定时炸弹。他说：“我有信心不成为定时炸弹，我要是炸弹，就去炸美帝，炸陆定一，炸彭真，炸罗瑞卿。”

康生亲自出马发出号令，王力身先士卒闻风而动，根据康生的意旨，贴出大字报，将矛头直指王稼祥同志，直接煽动群众批判所谓“三和一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王力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要追查什么王稼祥的“复辟活动”，并且要“穷追到底”。原来在王稼祥同志提出被称为“三和一少”的建议被否定后，他在中联部的领导职权就被停止了，他请求中央另外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后来由周恩来同志批准，要他继续进行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为此，他要求中联部派几个人协助他进行并提供有关材料。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却被康生、王力之流说成是有人支持王稼祥搞“复辟”，要加以“追查”，将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周恩来同志。中联部的同志都知道王力的老底，50年代后期，他曾参加我国出席世界“和大”的代表团，团长是作家茅盾，党内则由他负责。在他同外国负责人的谈话中，也曾大念和平经，出力地散布和平幻想。可是此时，他竟成了反对“三和一少”的斗士，并且对王稼祥同志

进行了恶毒的诬陷。

正是在康生和王力的直接煽动和策划下，中联部的“造反派”揪斗了王稼祥同志，不仅在中联部机关内贴满了攻击和诬陷他的大字报，还将大字报和大标语贴到他的住处。我也看了一些大字报，其中有的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如有人“揭发”他在中联部造什么“宫殿”，其实事实很简单，中联部因工作需要计划新建一座办公楼，预算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批准，由我和有关的同志审定了设计图纸，在研究时曾经提出，为了工作方便，拟将部的领导同志和办公室主任等的办公地点设在二楼，开间也略为宽敞一些，以适应开会和外事活动的需要，许多机关也都是这样做的。可是有人却将此事夸大为造“宫殿”，此事不仅根本算不得什么“罪行”，并且也与王稼祥同志无关，“造反派”们完全是信口胡说，乱加罪名。

一般的人这样胡说倒也罢了，问题是有的负责干部说话办事也很不负责。所谓“三和一少”问题，其实既不是王稼祥同志偶然提出的，也不能算做是他一个人提出的。当时稼祥同志根据国内外形势，考虑了一些外交上使我国尽早摆脱困境的方法，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党委提出，一一征求了几位部的领导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并且可行的，便由党委决定，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建议提交给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示郑重，参加讨论并表示同意这一建议的负责同志，都在上送的报告上一一签上了名字。记得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只是我按照自己一向的习惯，虽然在时间上我是第一个签名，却把自己的名字签在靠后的地方，因此在报告的签名顺序上我并不在最前面。这个报告上送以后，我一直认为这个建议在政治上是合理的，在组织上也是合法的，我们都应对这一报告负有责任，而不应视做是王稼祥同志的个人建议。可是，这一建议并未被中央接受，并且受到了批评。康生早就嫉恨王稼祥同志，

 ——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